



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过的文化遗产

“红山文化”：中华文化的璀璨之珠

□ 柳 颖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员，见证了早期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各民族优秀文化对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影响。2019年7月1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赤峰博物馆，了解红山文化等史前文化发掘保护情况和历史沿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塞上红山映碧池”“峰红水碧，远望绿树千行，风光不让江南。”老舍先生1961年在游历赤峰时曾这样赞誉红山之美。位于红山脚下的红山文化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红山玉器、一幅幅生动的考古发掘照片、一段段凝练且内涵丰富的文字，吸引参观者不时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长江孕育了良渚文化，黄河孕育了仰韶文化，西辽河孕育了红山文化，它们同处于新石器时代，都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颗。在几百万年以前，我国东北地区西部、大兴安岭山脉与燕山山脉之间，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着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一千五百年之久的红山文化。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正式命名了“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最为重要的发现，是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组成的规模宏大的牛河梁祭祀中心，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考古学家



辽三彩鸳鸯壶

苏秉琦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大熔炉”。在诸多命名的文化序列中，红山文化独树一帜。当不同地域的文明进入这个大熔炉之后，便携带着各自的文化特色，不断扬弃创新，形成了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

赤峰博物馆展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遗址航拍照片。该遗址是我国东北地区与内蒙古东部经过全面考古发掘出土的目前国内第一个显现出房址、窖穴、墓葬等全部居住遗址的史前中华始祖聚落，被学术界称为“华夏第一村”。其农业系统——散汉旱作农业系统于2012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全球第一个旱作农业文化遗产，赤峰散汉也因此被誉为“世界小米之乡”。该遗址发掘出1500多粒发黑的粟、黍碳化颗粒标本，被认为是全世界人工栽培的、时代最早的谷物。正是有了近万年的禾盛黍丰，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距今5000—6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成为古代文明的诞生地。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物——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大型碧玉龙，属于中华大地最早的红山文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华夏第一村”“中华第一龙”等考古发现成果雄辩地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共同体。红山文化遗址作为一个整体，从聚落、祭祀、墓葬、出土器物等角度全面展示出中华文明起源

过程中北方地区独特的文化面貌和突出成就，以实物遗存见证了中华文明不同区域间的文明交流，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古文化交流汇聚的典型例证

文物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进行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鲜活教材。赤峰博物馆展出的“辽瓷”，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手法，又有自己的特点，被称为“辽三彩”。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出土的黑彩红陶筒形罐，红色陶体之上绘制的黑色纹饰，有来自中亚一带的菱形方格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和吸收了仰韶文化彩陶技法创造出的龙鳞纹。苏秉琦曾评价，“这是5000年前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这里交流汇聚的典型例证”。

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西部的草原文化、东南部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均有文化交流，频繁接触并迸发出文明“火花”。表现为具有东北地区古文化特点的“之”字纹夹砂陶形罐与仰韶文化特征的泥质红陶彩陶并存，代表渔猎游牧经济的细石器、打制石器与代表农耕经济的磨制石器并存。红山彩陶纹饰一直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吐故纳新。红山文化彩陶既吸纳了黄河流域彩陶因素，又

保持了自身的特点，说明红山文化是以继承本地文化为主，同时吸收周围先进文化而发展起来的。

从出土的石质工具能看出，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规模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原因在于：一是受到中原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原先进农业技术被带到辽西地区；二是人口大量增长迫使红山先民寻求更稳定、更高产的经济活动方式；三是红山先民所处的时代正值气候大暖期，适合原始农业的发展，诸多因素促使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迅猛发展。在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东北部平缓台地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量的鱼骨以及少量的大型淡水蚌类动物骨骼。从这些遗存中可以得知，红山文化历经千余年，经济类型也体现了承前启后、交流互鉴的样貌。早期渔猎所占比重略大，中期农业开始发展，晚期农业与渔猎并重，从而形成渔、猎、农并行的多种生产模式。

赤峰博物馆的黄金长河展厅，展出了清代的格萨（斯）尔手抄本以及当代的格萨（斯）尔全书。《格萨（斯）尔》是由蒙、藏、汉民族共同创作的英雄史诗，讲述了格萨（斯）尔降临人间降妖伏魔、各民族和谐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英雄故事。“格萨尔”因为音译不同，在内蒙古也被称为“格斯尔”。赤峰市巴林右旗是蒙古族格斯尔的重要发源地，被誉为“中国格斯尔之乡”。2006年5月20日，格萨（斯）尔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以历史遗存为媒介，穿越历史的长廊，我们似乎可以窥见红山先民日常生活的点滴。他们的智慧、精神、文化不断交流互鉴，既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来时路”，也是促使中华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的“行之途”。红山文化凝聚起共同的文化心理，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造就了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最初的“文化认同”，为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稳固基石。

君子文化蕴含的家道伦理与社会担当

□ 杨朝明

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有一天和鲁哀公对话，鲁哀公希望找人帮助治理鲁国，孔子告诉他人可以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圣贤是儒家最理想的人格，君子也是比较高的境界。孔子不把自己当成圣贤，但是以君子自许，勇于做君子其实应该作为一种人生追求。

君子的“君”，文字结构上本来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尹”下面是“口”，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君就是治世的人。君者尊也，君子就是引领者发布政令，小人就是普通的民众进行跟随。一提到“君子”，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个有修养的人，马上就想到有教养的人。“君”“子”合在一起我们马上想到《大学》里面“欲治其国之先齐其家”和“家齐而后国治”，这意味着家庭教育和社会价值观的融通。

这对于我们今天怎样教育孩子，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如果不让孩子融于社会，不让孩子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求一致起来，就成不了被社会大众认可的君子。“君子”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就意味着家庭教育的方向。如果我们再把《论语》和《大学》联系起来读，《大学》字数并不多，却用大段不厌其烦地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及修、齐、治、平之间的联系，特别强调的是方向感和逻辑性。这也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的关联。

由此，我想到《礼记》所记曾子的话：“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大孝尊亲”就是“大孝使亲尊”，大孝的孩子一定让父母更加尊荣。例如，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一个孩子的父母是普通百姓，儿子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最终高中皇榜，父母一定比儿子还要高兴幸福。所谓“大孝尊亲”，可谓内涵丰富。年轻人只有对社会有贡献，被社会接纳、认可、嘉许，父母才更受社会尊重。中国人追求“扬名声，显父母”，也是君子文化的内在意义。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和家庭教育协同与协调，也要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统一起来。教育的方向就是要使受教育者遵守、接受社会价值观的约束，力争得到社会的认可。正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但如何树立正确家风，需要认真思考。

教育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所作所为不被社会所认可，教育的方向就出问题了。弘扬中华道德，就要理解道和德的关系，君子要光宗耀祖，不仅是自己家的事，还是国的事，这就是家、国之关联。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是家与国的相互融通。所谓“其次弗辱”，就是即使不能光显父母，也不能辱没父母的名声。如果说一个人没教养，一定是父母没教好。至于“其下能养”，养是最基本的。当然，有些孩子连自己都养不活，例如那些“啃老族”“巨婴”，就别谈什么“孝”了。

中国孝文化在君子文化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真正孝顺父母的人就要做君子，做有修养的人。因为只有做有修养的君子，才能扬名声、显父母，光大门楣。中国人的故乡情结、祖宗观念、孝亲意识，是中国人独有的深沉的情怀。中国人对父母的孝是做人的根本，《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讲“成其亲”，就是成就父母的名声。《论语》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志”就是心之所指，就是心的方向。我们立什么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父母指引的结果。年轻人走好自己的人生路，父母是引领者。父母生了我们，养了我们，教了我们，使我们成为有教养的人，我们就成为君子。父母不一定是君，但是他们像君一样。君，在其位者，有其德者，父母就像在位之君。子女的教养为父母争了荣誉。反过来，“父在，观其志”，实际上也强调了家庭教育中父母引导孩子立大志的重要性。

中国人重视“家”，在很大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是关于“家”的哲

学。当我们把家庭伦理放大为社会伦理的时候，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现在很多企业、单位常常强调“家人”意识，这一定是家的温暖在这个群体中得到呈现。把这个群体都当成自己的家人，家庭伦理就变成一种社会伦理。“君子”这个词让我们得到很多启示。中国文化强调孝悌，注重家庭，一个人从家庭走向社会，在家庭里面有教养的孩子，到了社会上也容易成为有修养的君子，中国文化就具有这样的底色。

儒家之学强调君子的社会担当，君子是一种社会角色。如何成就自己的君子人格？人要学会修身，就要学会与自己相处，就要正确安放自己的心灵，引导自己的心情，陪伴自己的孤独。儒家强调主观能动性，儒家说“道，自导也”，这不是被动的被引导，而是主动积极地自我引领。人能认识自己的天命，就能享受一份“丰富的宁静”。学会和他人相处，就会推己及人，换位思考。人要立于天地之间，就要做一个大写的人。做有爱有敬的人，就能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

把『象牙塔』建成育人、创新的『灯塔』

□ 李清泉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需要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责任使命，在多重国家战略中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者与推动者。

纵观世界科学史与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科学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的多次转移变迁，高校在世界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的产生与转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三者协同推进的紧密程度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演变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发展同向同行，大学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逐渐从发展体系的参与者成为有力的支撑者乃至引领创新的先行者，涌现出诸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大学集群化与湾区城市群互动发展的典型。当前世界科学中心存在向亚太地区加速转移的趋势，我国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需要从学习国外模式转向创建中国特色模式，以一流的教育提供战略支撑，以一流的科技力量提供创新驱动，以一流的人才资源提供发展动能，适应未来社会趋势，引领未来社会发展。

著名教育家竺可桢先生曾言，“大学犹为海上之灯塔”。为实现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高校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将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逻辑紧密衔接，从独善其身的“象牙塔”、知识生产的“服务站”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灯塔”转变，深度参与区域发展的价值共创，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科学中心形成的重要引擎。

构筑人才高地，以一流的人才资源提供发展动能。人才兴则国家兴，人才强则国家强。高校从诞生之日就天然成为人才集散地，具备系统性、专业化培养人才、挖掘人才、造就人才的最大潜力。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与深层挑战，高校必须结合自身建设实际和特色优势，聚焦若干关键领域加快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高地，着力培养一批又一批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型建设者。一方面，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建成胸怀“国之大者”、脚踏实地、忠恕任事的育人“灯塔”。以学生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稳步推动以适应工业社会的学历教育和专业培养模式向更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终身教育和全人培养模式的内在转变，加速实现我国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尤其是引领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红利”的历史性转变。另一方面，要抓好师资队伍队伍建设，“以最优秀的人才培养更优秀的人”，把立德树人人与人才高地建设结合起来，厚植“伯乐千里马”良性互动的识才、用才、聚才优良生态，着力打造文化引领、近悦远来、创新思想交相辉映的师生“灯塔”。通过聚天下之名师育天下之英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以高等教育的强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引领科技创新，以一流的科技力量提供创新驱动。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要全面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加速转移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是强化源头创新，瞄准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加强基础研究，以十年磨一剑的长期主义精神扎长桩、打硬仗，勇闯“创新无人区”，抢占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努力建设成为创新策源地，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二是强化有组织科研，推动科研范式创新，以“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为关键抓手，增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承接国家重大项目的本领，推动重点领域战略平台、重大项目、关键人才、资金资源一体化配置。三是强化经世致用，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在服务产业需求和解决“卡脖子”问题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务实推向具体产业和多元应用场景，有效构筑与新质生产力要求相适应的创新高地。

构建“大学—区域”命运共同体，以一流的教育提供战略支撑。城市因大学而兴，大学因城市而盛。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发展同向同行，一流城市与一流大学双向融入、相互成就。高校需要在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交织演进中探索构建利益共生、责任共担、发展共荣的命运共同体。一是站在全局角度系统谋划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面向科技创新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瞻推动学科交叉会聚，适应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二是探索新型产教融汇模式，优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创新体系，要结合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比较优势的高校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业制宜，加快建设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跨界联合培养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载体、有针对性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长期可持续的“大学—人才—社会”多方联动格局，推动环高校创新创业生态圈迭代升级。三是以世界广度、中国高度和改革锐度，构建大学与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名城—名校—名企”的共生演化，促进“青年—大学—城市—国家”良性互动，将高校建设成为国家及区域开放式创新与共生式创新的“灯塔”，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党委书记）



大学书记校长论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